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历史文化艺术/聂锋, 祁淑虹著. —兰州: 甘肃
人民出版社, 2000(2007 重印)
ISBN 978-7-226-01736-4

I. 敦... II. ①聂... ②祁... III. 敦煌学—文化史
IV. ①K870.6②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7515 号

责任编辑: 连凌云
朱满良
封面设计: 宋武征

敦煌历史文化艺术

聂 锋 祁淑虹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甘肃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2 字数 300 千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7,001—8,000

ISBN 978-7-226-01736-4 定价: 28.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前 言

敦煌,有着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这一文明,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特别的自然生态面貌及其演变,奠定了它在中国历史和世界文化艺术发展史中别具一格的重要地位。

敦煌,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最重要军事战略要地之一;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最重要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发展地之一;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中西交通交流枢纽地之一;是中国古代及当时世界文化最重要的交流、汇合、扩散地之一;是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佛教文化艺术中心之一。

敦煌,现今地域面积虽仅 31200 平方公里,但它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曾有过特殊的历史贡献。因为,它孕育出了敦煌莫高窟这一随着历史发展变化时隐时现,不断显示其博大精深,至今仍折射着夺目历史光辉的文化艺术圣地,这一世界文化艺术的宝库。

中国古代敦煌地区的历史演变发展,在同中华民族历史演变发展相一致的同时,又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原王朝统治巩固、稳定发展时,敦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事业也蓬勃向前,蒸蒸日上,成为中西交通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从而使各民族间团结融合,共同发展和进步。在中原王朝衰落、崩坏,内地战乱、分裂、分割时,敦煌地区要么为少数民族所占领统治,而一般则成为小环境较为安定的“福地”,成为中原各地人民和文生儒士逃避战祸、保存

和进一步发展民族文化的较稳定地区。

我们并非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但此种时期,敦煌地区较为松散的政治统治、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生态环境,为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曾做出了特别的历史贡献。

敦煌地区的历史、文化与艺术,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中极其光辉灿烂的一章;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与艺术的辉煌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延续和发展;是中西历史、文化与艺术相互撞击、相互吸收而结合的结果。敦煌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发展,既是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发展并向西推移的结果,又是作为中西沟通交流枢纽与“咽喉”的中国西部与中亚、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汇合交融的结果。敦煌地区特别是促成了中原文化和艺术与西部文化与艺术,中亚、欧洲的文化与艺术融汇结合后,反传再进入中原地区并对中原文化与艺术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中西交汇融合后的文化与艺术也再反传进入西部、中亚和欧洲等地,对其文化与艺术的进步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就现有的地质、考古资料,我们还很难确切地说明远古时期敦煌地区的历史面貌。但从现今敦煌及邻近地区已发现的大量的、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性质待定的原始文化遗迹遗存中,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敦煌地区的人类历史活动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甚或更早的时期。与北京人、河套人、山顶洞人共处相同和相近纬度的敦煌地区,远古时代有着更适于人类生存发展的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况且原始社会生产工具简陋,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有丰富遗存遗物的新石器时代敦煌地区所居人类,是不可能远徙而来的。那么,敦煌及其附近地区是否是人类的又一重要发源地,这还有待于地质、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现。

古代中国的敦煌地区,无论从其历史演变、建置沿革的角度,还是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交流的角度;无论从敦煌地区文化艺术的发展变化,还是从历史地理、历史

地域的诸多方面去考察认识,都应当是一个范围极其广泛的历史概念和历史地域概念。无论远古时期稍后的“三危”、“流沙”地,还是文明时代的“敦煌”、“沙州”,敦煌地区大都以现今的敦煌市为中心,以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艺术紧密联系和辐射于:北面的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南部和俄罗斯的一些地区;西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域)东部,有时甚至直接影响其中部地区;南面则直跨青海省,联系和影响西藏自治区及四川省的西北部;东面达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北部地区;东南面直连整个河西走廊地区,影响兰州及其附近地区(陇右)。自然,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敦煌地区的意义,又是和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的边疆地区地域概念密切相关,而伸缩、变化和发展的。

进入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敦煌及附近地区的人类活动更加频繁。我们认为,就敦煌地区原始社会末期的实际情况而言,当时的敦煌地区,古籍中追记的“三危”、“流沙”、古“雍州”,地域范围是十分广大的,不能把它仅限于今天的敦煌市。它既是一个地域概念,又是一个历史文化文明发展的概念。自然,敦煌地区的原始社会时期相对于中原地区要稍为长远一些。我们研究所表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敦煌地区的人类活动更加频繁,一方面是这一地区考古挖掘资料的不断涌现的有力证明;另一方面是我国众多的史籍都开始有了较多的记载,并证明当时这一地区的文明文化的发展同中原地区基本同步,且相互间开始有了联系,并不断加强和密切着这种联系。

春秋、战国和秦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分化、改组和变革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前期的敦煌地区是相对稳定的时期,其奴隶制的开始稍晚于中原地区,延续的时间则稍长久于中原地区。这一时期的中晚期,敦煌及周围地区由于匈奴等游牧性更强的民族的略带封建制的半奴隶制的推动和影响,

最重要的是在战争的推动下,加速了中原地区影响的进展,开始发生了较大的变革性的变化。原有的游牧民族大量迁徙,开始进入西域、中亚等地区,进而最终影响了这些准内陆地区的居民构成,影响了这一地区的历史发展和历史进步。

历史的大变革、大分化和大改组,必然带来历史的大发展。随着中国历史进入汉代,敦煌地区迎来了一个决定自己今后历史、文化与艺术历史地位的大发展时期,这是与敦煌地区地处当时西陲战略要地的地理位置直接相关的。汉代的国防,特别是在汉代的前期,最为重要的就是对付日益强大并开始影响汉代统治者政权巩固的匈奴族的南向扩展势力。为此,直接引发了中原汉王朝与西域、中亚各地区的联系的进一步加强,而敦煌地区重要的地位就显露了出来。从这一方面而言,是匈奴民族侵汉的行为这一契机客观上促成了敦煌地区历史地位的不断上升。敦煌地区从此开始成为中原王朝最为重要的边疆军事战略要地之一,成为中西陆上沟通交流最为重要的桥梁和纽带。当时及以后,“丝绸之路”宽泛的意义,已不仅仅是“丝绸”贸易而已,它开通之日就已经在汉代直接转化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艺术、生产和生活方式交流传播的“文明之路”。遥遥千万里的“丝绸之路”,撒满了传播人类文明进步的种子,这些饱含着各民族人民智慧和民族精神的精华的种子,从东撒向西,从西撒向东,互相交流融合,发芽生根成长壮大,为推动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历史情形,无论是中原王朝高度集权专制统治稳固的条件下,还是中原动荡衰乱时期都是一致的,只是影响和贡献的范围及大小有所区别罢了。

随着汉王朝各种矛盾的激化,开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走向覆灭,中国自秦以来形成的统一的封建专制之网,第一次被扯破。至隋王朝重新统一之前,虽有局部的统一,短暂的全国统一,但就总体而言,中原大地再没有形成坚强牢固统一的历史时期,中国历

史进入了一个空前动荡混战的时期。这一时期敦煌地区的历史发展有自己特殊的自我成长发展的意义,从而为敦煌历史、文化与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敦煌地区,虽也有政治统治权的不断更替,但这种政治变革、政权更替相对来说对敦煌地区整体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的发展,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害。所以,在这一大动荡的封建势力重新分化组合过程中,敦煌地区的震荡是较小的,反而促成了其间的民族大融合,促进了敦煌地区文化艺术的发展融合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高潮。为此,准备了敦煌地区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为中西交通交流的进一步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北周王朝对北方地区的统一,为隋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隋的统一全国,又为唐王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的空前发展准备了条件。从北周时期到唐王朝前期,在原有基础和条件准备的情况下,敦煌地区较平稳地过渡到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最繁荣发展的时期。唐王朝的历史,对史学界各史家而言,一般是“大书特书”的。这一时期敦煌地区的历史,无论是其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特别是其文化艺术的发展,掀起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又一个高潮,其文化艺术成就也进入了中国封建时代敦煌地区文化艺术成就的最高峰时期。

唐王朝盛极一时的统治和发展,自“安史之乱”后,开始走向衰落,其后虽也出现过断续的“中兴”,但终究无法挽回其覆亡的命运。这种中心统治的危机,反映到敦煌地区自然有其特殊的历史表现,是敦煌历史、文化、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

唐王朝中后期,直至五代时期,敦煌地区先吐蕃后西夏先后两次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统治,进入了敦煌地区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又一次高潮。在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影响下,虽然敦煌地区一段时间里遭受了落后的“农奴制”的统治,但这一时期民族间相互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交流交往都得到了进一

步的发展。

唐代以后,敦煌地区的历史地位开始下降。随着海路交通交流的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特别是远洋航海能力的不断加强,通过海路的贸易和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联系加强了。这种情势,特别是明代封闭嘉峪关以后表现得最为明显。

20世纪之初,敦煌及周围地区历史、文化与艺术遭到了空前的劫掠,对此一问题,见诸中外文字的各种论证评说很多很多。如何公正客观地评论这场空前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大浩劫,是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的。作为历史的考古学家、探险家,以及对敦煌及周围地区历史、文化与艺术事业认识研究的客观推动方面而言,我们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的一些行为是有某种客观贡献的。但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抑或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盗,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敦煌及周围地区历史、文化与艺术的破坏、损害、劫掠是空前的,也是有罪于中国历史、文化与艺术的,同时也是有罪于世界历史、文化与艺术的。这方面留给我们国人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和惨痛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身上都充分地表现了这种学者与强盗加骗子的双重性特点,正是这种双重性,一方面给敦煌及周围地区历史、文化与艺术的研究开创了认识研究的新天地、新方法、新思想,甚或他们中的一些人的某种敬业精神、冒险精神,也是值得我们重新认识的;另一方面使我们认识到,对民族历史、文化与艺术遗产、遗物、遗迹的保护,一定要建立在坚强的国家力量的基础之上,如若国弱民衰,还谈何保护历史、文化与艺术遗产、遗物、遗迹?!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无数历史、文化与艺术珍品珍本散落于世界十多个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有些甚至堆放于他们的地下室中,任其腐烂变质发霉,失去其昔日的永远无法找寻的光辉,这是今天敦煌学学者们所切齿痛惜的。散落于国外民间的、国内民间的,主要是国外官方、国家的敦煌历史、文化与

艺术遗物不计其数。仅原苏联列宁格勒(今俄罗斯圣彼得堡)就珍藏着敦煌文献 12000 余件,相关的极其珍贵的黑城文献 9000 余件。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与艺术财富,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历史、文化与艺术重大贡献的实证资料。对此,我们相信,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事业交往交流的不断加强,随着中华民族的强盛,一定会有新的进一步的转机的。这也特别需要爱好和平、珍视友谊的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它扼据玉门关、阳关,西通葱岭,东接河西走廊,地势险要,成为中国古代中西交通的重要枢纽。“西出阳关”在当时意味着凄怆悲凉的离别,“生还玉门”则象征着归于故里幸福重聚的欢乐。

西汉时武帝促成了中西陆路交通的畅通,是人类历史上的丰碑,为中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敦煌莫高窟的修建创造了条件。约 2 世纪前后,敦煌就开始在驰誉中原的凉州文化中初露头角,同时出现了一批能工巧匠。为此在敦煌莫高窟创建以前,敦煌就已经成为一个封建经济与封建文化相当发达的地区。我国汉晋时期传统文化艺术,在敦煌地区早已有极为深厚的基础,它主导着敦煌地区佛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佛教壁画、佛教塑像的表现形式在敦煌莫高窟的出现创造了社会生活条件。

十六国时期的战祸离乱、内煎外逼,促使人们把佛教的“众生皆苦”、“因果业报”、“轮回转世”当成了当时“人间苦海的圣光”。在敦煌莫高窟最早的洞窟遗留中,有许多反映了人们热切企盼“弥勒下生”的具有时代特征的题材与形式。

到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在佛教文化艺术的传播发展中,敦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莫高窟的佛教文化艺术事业也逐渐到达了自己的顶峰时期。

早在两汉三国时期,佛教文化艺术就从印度经中亚、西亚和西

域进入中国中原地区。这时随政治和经济交流交往进入中国的佛教文化艺术,是首先在敦煌地区与中国汉晋中原文化撞击、融合,然后再逐渐进入中原地区的。

当时,信仰佛教和开窟造像是人们追求幸福平安的一种表现形式。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僧人、使者的这种宗教迷信感更为强烈,他们怀着对西部险恶的自然环境的恐惧,供养神灵佛祖,捐钱开窟造像于西去的始点敦煌,以祈求平安、祈求保佑。平民百姓则希望丰年长久,平安盛世,为满足这种心理需求和安慰,也加入了开窟造佛的行列。

为此,他们一致选择了风光秀丽,具有独特地理环境优势的敦煌鸣沙山下、宕泉河旁的清静优雅的敦煌莫高窟为他们心灵的殿堂、神灵佛祖的驻地处所。

敦煌地区是我国佛教流播较早的地区之一,但在民间流传的情况却是因时而异。世代相传的佛教成为敦煌地区占重要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一,它不仅是敦煌人民信仰的精神需要,也是周围各民族信仰的精神需要。

在古代封建社会的敦煌地方和同时期全国的封建社会一样,它的政治、军事、文化、宗教,无不受到有限的较低下的封建生产力的制约。佛教只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当时的敦煌地方,但它绝非是支配一切的思想。相反是世俗的政治经济生活随时支配着佛教,不但支配着它的内容,而且支配着它的形式。

通过敦煌莫高窟的艺术形式,我们不难看出,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那一幅幅的壁画构成了一部传承有序、跨越千年、绵延不断的古代历史画卷。它形象生动地表现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和全貌,包容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音乐、舞蹈、体育、民族、民俗以及中外人民友好往来等极为珍贵和丰富的历史资料。

敦煌艺术,主要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等石窟的建筑、彩塑、壁画三大综合艺术。在这艺术瀚海中,历经千余年,跨越十几个朝代的沧桑变迁,都以其丰富的内容、生动的形象、变化多样的构图、独特的艺术风格、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引起世界的瞩目。但在黑暗统治时期,它自然也得不到很好的保护,遭到被帝国主义者窃掠的厄运。

敦煌莫高窟首创至今已有 1600 余年的历史,十六国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均有开凿。现存较完整的洞窟有 492 个,现存壁画 45000 多平方米,连接起来可达 25 公里,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艺术画廊。现存彩塑 2415 身,历经千百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现基本完好的 1400 余身,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最灿烂的艺术瑰宝之一。

在距离敦煌市区 25 公里处,在鸣沙山和对面三危山之间,有一条泉水河,名叫宕泉河,有了这股宕泉河的水,就有了莫高窟的存在。敦煌莫高窟就建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下。四周是荒凉的沙漠,只有这小小的一片绿洲,点缀了这荒凉的戈壁。过去的宕泉河踪迹全无,现在只剩一支细流,从石窟南方曲曲折折地流经整个莫高窟,潜入砂碛之中。有了这股泉水,构成崖上和崖下截然不同的景色。崖上是一片黄沙,荒凉满目,崖下则是绿树成荫,清泉萦回。错综在灰色崖壁上的石窟群,彩画纷披,错落有致,掩映于绿树丛中。

据说,在公元 366 年(前秦建元二年),一名叫乐僔的和尚云游到此,这时正近黄昏,太阳快要沉落在茫茫无际的沙漠中。蓦一抬头,在他眼前出现了奇景:对面的三危山一派金光耀眼,好似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和尚被这奇景眩惑了,他想:这真是一块圣地。于是他就在开凿了第一个洞窟。

由于沙漠空气和洞窟墙壁极度干燥,使用的材料性能耐久,所以,莫高窟才有幸保存到至今。

敦煌莫高窟从前秦创建,以北魏为起点,一直走着上升的道路。到了唐初,已经有一千多个窟室,因此又称敦煌莫高窟为“千佛洞”。

一千多年的历史积累,形成了莫高窟艺术的丰富和复杂。只要我们一走进这艺术殿堂,就会被这四壁辉煌、神采飞扬的艺术作品所迷住。

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自公元 366 年乐僊“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僊师窟侧,更即营建”^①,至北魏晚期的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和北周时期的建平公于义又继续提倡建窟造像,此后又历经隋、唐、宋、西夏而迄元代的继续修建,最盛时“计窟室一千余龕”^②。敦煌莫高窟许多洞窟经历不同时代一再重修,面目已绝非当昔;加之长时期以来的倾圮、毁损,莫高窟初创时期的洞窟已很难寻觅。司空索靖题壁号仙岩寺处,沙门乐僊开窟一龕处,已无从查考,或许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敦煌莫高窟艺术的风采依旧,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历时千余年,风格多样,千姿百态,反映中西交通交流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丰厚历史画卷,是人类文明史的优秀成果,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

敦煌莫高窟从十六国时期创建,经历过约 11 个朝代的持续营造,陆续出现了以大乘佛教不同时期、不同宗派所崇尚的经典为根据的壁画和彩塑。仅它现存的 492 个石窟的内容,就涉及了佛藏中的经、律、论、史四大部分的绝大部分内容,由此它构成了今天世界上保存得较为完备的佛教美术馆与佛教图像宝库。它的题材和内容,除经籍之外,有些见诸画史和古代笔记,更多的则不见于著录,又缺题记,由此就更加显得珍贵。这部巨大的阌文宝典,经过

① 武周圣历元年(公元 698 年)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龕碑》。

② 同上

众多的敦煌学学者的艰苦努力和不断探讨,已经取得的成果,举世瞩目。

亚欧历史,中国历史,中西交通交流的历史,河西与敦煌的历史,在敦煌莫高窟留下了十分清晰和深刻的烙印。可以说,敦煌莫高窟文化艺术是历史的产物,是世界文化艺术史的产物,是中国文化艺术史的产物。它的形式与内容脉络分明地反映着各个地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面貌,为我们探究人类历史的脚步提供了丰富、生动、形象的历史资料。

党项族西夏政权、蒙古族元王朝及明清时期,敦煌莫高窟艺术走进了它晚期的后半期。这一时期,莫高窟作为佛教圣地和佛教艺术圣地而言,已失去了它往昔的那种光辉与地位。作为敦煌莫高窟艺术创造和艺术发展的历史,到元代已经可以算是结束,明代是一段空白的时期,清代虽然翻修过一些洞窟,但只限于塑像。在中国西北地区腹地敦煌莫高窟,一个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的开始,中经蒸蒸日上的发展,最终走向了自己惨淡的艺术创造的结尾。但它使我们从其色彩、线条和造型中,回顾遥远的过去,去体验那些时代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在莫高窟艺术力量的感染下,重返激动和震撼人心的时代。

敦煌石窟,包括今甘肃省敦煌市境内以敦煌莫高窟为主体的古敦煌境内的西千佛洞,今安西县境内的榆林窟,东千佛洞,小千佛洞,今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五个庙、一个庙等石窟。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大部分时期,这些石窟都在敦煌郡置范围内,其内容和艺术同属一脉,我们总称之为敦煌石窟。为此,本书中的敦煌艺术内容部分,仅以敦煌莫高窟艺术内容为主体出现。

敦煌石窟艺术是敦煌艺术的一部分,是敦煌学研究的,由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壁画艺术三者紧密结合而成的综合体艺术。敦煌艺术主要是指敦煌石窟艺术,还包括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绢画、麻布画、纸画、写本以及敦煌地区的其他文物艺术品,如古墓壁

画、画像砖、汉简书法等。又此，本书中的敦煌艺术内容又仅以敦煌石窟艺术中的敦煌莫高窟建筑、雕塑、壁画艺术为主体出现，亦是敦煌文化艺术的主体。

第一章 石器时代及汉以前的敦煌地区

第一节 旧石器时期的敦煌及其周围地区

1922—1932年,杨钟健和德日进、桑志华在内蒙、甘肃、宁夏、新疆、陕西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采集到许多零星石器。这些石器从打制方法上看,大部分都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也都产生在黄土层的底部砾石层中。当时考古工作者认为,在这一地区很有希望找到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

193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先生,在河西走廊西北端的酒泉北部敦煌附近明水地方,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打制的石器。

20世纪80年代在玉门昌马地区再次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迹。同时,从酒泉银达乡上沟村沿北大河岸,发现了象牙化石,从北河滩上采集到了牛角化石,从屯升乡沙山村北草沟井滩,寻觅到了珊瑚虫群体化石等古脊椎动物和古生物化石。这和20世纪50年代从嘉峪关、酒泉附近文殊山口外戈壁中的发现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及以远时期,在百万年至几万年前,河西走廊地区西北部,包括敦煌在内,其自然生态环境和林草植被是适合古脊椎动物和古生物生息繁衍的,其时的气候温暖湿润,沼泽湖泊遍布,大河小溪纵横,有大象、珊瑚赖以生存的

绝好条件。同时,也说明在人类的童年阶段,与“北京人”、“丁村人”、“河套人”、“山顶洞人”处于相同和相近纬度的河西走廊的西北部地区,这块适宜于人类生息繁衍的、土沃水美林草丰茂的地域,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此后,随着气候的变化,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的变化,这一地区的早期居民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向东南迁移,随同仰韶文化的居民成为现代华北人的祖先。^①

1993年1月,在敦煌西北方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距哈密市160公里处的飞跃车站,发现了长约八九米的巨犀化石,在其周围还挖掘出两具与其共生的龟鳖类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所、中国地质博物馆有关专家的地质确认后认为:此一地区第三纪巨犀化石和龟鳖类化石的发掘表明,在3000万年前,这里是一片生活着巨型食草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森林草原,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②

敦煌盆地及其周围地区在当时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下,与河西走廊西北部其他地区一样,甚或更加适宜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断,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甚至早期,人类原始群落就活动于这一地区,他们亦是中华民族祖先的重要组成部分。

附注:

根据裴文中先生《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自《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中认为:中国石器时代文化分期,应为60万年前—2.5万年前为“旧石器时代”,2.5万年前—5000年前为“新石器及中石器时代”。

① 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

② 聂锋《农业与畜牧业转换对西北历史生态的影响》。

第二节 新石器时期的敦煌及其周围地区

公元前 5000 年到公元前 3000 年,在中原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已经影响到甘肃、青海等地。新石器文化的遗址和遗物在西北各省各地都有发现,仰韶文化的陶器显示其文化直达甘肃洮河流域及内蒙古南端。

同时,我国西北部的新疆、宁夏、内蒙古的有些地方也分布着不少细石器文化的遗址。其特征是陶器较少,而且制陶技术较差,陶器上常压有篦纹。石器是以用燧石、玛瑙等坚硬石料打制成的细小、精制的刮削器、刀、钻和矢镞为主。磨制石器较少。骨制工具有鱼叉、鱼钩等。出土的兽骨、鱼骨较多。显然,渔猎和牧畜在西北原始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龙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它的年代大约是从公元前 2800 年到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及相毗邻的湖北、江苏、辽宁、甘肃等省区。也有很多与龙山文化相类似的原始文化遗存,特别是“玉门驢马文化”、“平凉安国文化”,其对比的主要资料,陶器的形制、制作方法和纹饰布局与组成花纹图案的基本字母体等许多方面,都有一脉相承和继往开来、递次演变发展的线索,是具有人类文明初创时期的共性的。

我国北方地区广泛地分布着一种特殊性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石器中包含着许多打制精巧而细小的细石器,因此定名为细石器文化。这种文化遍布在长城以北,在东北、内蒙古、甘肃和新疆一带都有发现。考古工作者认为,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等地的遗址,都属于“牧畜、狩猎型”的细石器文化,因缺乏农业生产工具,当时是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的经济来源的。同时,在各地遗址中的细石器文化特征,出土的少量彩陶片,又说明其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相关的或是相互影响的。后来考古发现证明,仰韶文化西端

达到了甘肃境内渭河上游、洮河流域，甚至于个别的还远到青海民和县。其上层文化遗存还有龙山文化覆盖或交错。

194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发掘、研究、发表了有关渭河流域、西汉水流域、洮河流域、大夏河流域、黄河上游，特别是河西走廊地区的有关考古资料，使我们对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及中石器时代过渡的河西走廊地区包括敦煌地区，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可以较为清晰和明确地认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中后期生活着的，和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而又独具地方特色的，具有发达的远古文化的居民及其当时的历史状况。

约从公元前2万年左右一直到公元前5000年至2000年左右，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人们从狩猎、采集进入到锄禾农业和畜牧业，磨制石器广泛使用，发明了陶器，氏族公社代替了原始群落。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是其代表。

在甘肃还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及大量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属于原始社会中、晚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存。甘肃省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甘肃西部及青海湟水流域的科学发掘，取得了大量资料，从而对甘肃远古文化发展的先后排列顺序、各类文化发展分期、社会性质等，提供了科学的实证，从而使我们对甘肃河西走廊西北端及相关地区远古文化中的“仰韶文化”、“甘肃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较明晰的认识。

1956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酒泉果园乡高闸沟村南侧的北大河崖壁，发现了距今3700年前后人类居住过的遗址。同年，下河清农场也发现了距今4000年前后人类活动居住的遗址。1972—1987年文物普查过程中，各地又发现了距今4000—5000年前后人类聚落遗址。1984年，酒泉边湾出土大量新石器晚期夹砂红陶片、陶纺轮、松绿石珠、骨珠、骨贝、石刀、石坠、石刮器等，还有两处